

『遺言』製造者

杨匡满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杨匡满

——「遗言」制造者

——“遗言”制造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京)新登字 097 号

“谎言”制造者

杨匡满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 100866)

北京文化艺术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毫米 32 开 16.125 印张 344(千)字

1993 年 7 月第 1 版 199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定价:10.50 元

ISBN 7-5043-2240-7/1·252

目

录

“遗言”制造者	(1)
发生在那个夏季……	(33)
被夏季所遗忘的	(66)
出山之前的高丰文	(78)
为了下一个早晨	(111)
基石	(123)
旋律大师施光南	(146)
一个冒牌登山队员的传奇	(180)
“硕鼠”落网记	(250)
流动的热土	(284)
在挫折与流言中	(299)
一支乐队和三个乐师	(308)
捡拾起失落的阳光	(315)
人生对她如此厚爱	(335)
浓重而又迷惘的乡情	(365)
五环旗下的追悔	(376)
1986：恋人的匈牙利	(431)

“遗言”制造者

我已做了父亲，但我刚刚长大，
我和我的人民一起成熟。

——旧作：《清明的回忆》

—

他推开门，走到我面前。我们像老朋友那样伸出手来。他身高一米八四，象个山东小伙儿（我后来知道，他妈妈果真是山东人呢）；可他肤色白净，分明又是“天堂”一带的人。他两腿修长，背一个北京学生常用的褪色的黄书包，走路飘逸，颇有点韵度。他魁梧又秀气，温文尔雅，还带着几分女孩子的腼腆。

他是南方哪个青年排球队的运动员吗？

他是北京哪所大学刚入学的新生吗？

都不是。他就是那个震惊中外的“周恩来总理遗言”的制造者。现在我要写的，就是这位“遗言制造者”。他的名字叫李君旭。1976年的时候，他刚23岁。

二

关于一个人恋爱婚姻方面的谣言，是这个人成名的标志；关于一个国家的政界人物方面的谣言，是这个国家政局动荡的标志。

1975年下半年至1976年上半年，可以说是我国有史以来政治谣言最发达的一年。发达到了在几亿人口中妇孺皆知的程度。这些谣言的矛头，无一不是针对着把中国拖入十年内乱的以“武则天”自居的那个女人和她裙下的政治暴发户的，而且有不少并非谣言。但是，其中影响最大、传播最广的，则的确确是假的，这就是“周恩来总理临终遗言”。它2月中旬在杭州出现，几天内风靡全城。它借助着中国人传统的亲朋好友之间频繁的感情联络，借助着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邮政渠道，到3月底、4月初已经传遍了大半个中国。除西藏、新疆这些僻远的省份之外，各地均有数以千万计的抄本。而且，十多家外国及香港的广播电台播发了有关这个遗言的消息。

人们兴奋、激动，又有几分紧张，就像在暗夜中发现了火光。在人们被压抑得窒息的时候，“遗言”是安慰也是希望。在并肩而行的自行车上，人们交头接耳；在家庭的餐桌上，人们辗转相抄。即便是在旅途上，陌生人之间一谈起时局，一谈起遗言，也会像磁石一样立即引为知己。天下人，同此心啊！

3月底，当时的中央就以公安部名义发了紧急文件，追查这一“严重的反革命政治事件”。而在镇压“天安门暴徒”取

得“辉煌胜利”之后，这种追查也就火箭升级。凡看过、抄过、传过“遗言”的，一律要受到盘问。在东北某省的某个文化局内，局长大人亲自坐镇，召集几十名干部训话，限令当晚 24 点前一定要查出本局出现的“遗言”是从哪儿来的，不然一个都不准回家；在北京的某所大学，“工、军宣队”命令所有的学生都交一份书面保证，讲清楚自己同“遗言”有关的一切情况。自然，更不必说公安部门使出了十八般武艺，调动了现代化的侦破技术来对付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众多的“新生反革命分子”。仅在不大不小的安徽省就查出 6935 份“遗言”，以后收缴上来的又有 3028 份。神州大地，一时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奇怪吗？在“四人帮”那种超过了希特勒的法西斯高压之下，一个“谣言”竟能像细胞分裂那样迅猛异常地蔓延开来，竟能像洪水猛兽似地引起了某些可以把人当蚂蚁捏死的大人物的恐慌，足见其强大无比的威力了。

这个 23 岁的学徒工李君旭，真是胆大包天！毫无疑问，他立即被公安部列为需要紧急捉拿归案的“反革命要犯”。

三

一辆中吉普驶进了位于半山的汽轮机厂。这一天是 5 月 5 日，钱塘江畔已是初夏。天空灰沉沉的，似雨非雨，空气说不上是阴凉还是湿热，气压低得叫人发闷。

快近下班的时候，李君旭穿着工作服，蹲在一旁看他的师傅帮他修自行车。车间支部书记快步走到了他跟前：

“小李，有人找你，在厂部等呢！听说有公安局的人，你

说话可小心点。”

李君旭心里一怔。几天前已经有人盘问过他曾在哪儿见过所谓“总理遗言”，他一口咬定说是在大街的墙上看到的。

李君旭来到厂部办公室，四个穿着公安人员制服的陌生人已等在那儿。

彼此都是冷峻的眼光。唯有厂党委的高副书记——一个弓腰驼背的瘦老头儿，他还不太知道那群不速之客的真正来意，抢先一步拦住了李君旭，语调里分明有一种关切：

“小李，你就如实把情况说一说，快下班了，别误了回家，啊？”

李君旭照以前的口径说了。来人鼻子一哼：

“你这是谎话！我们已经查了。”

李君旭坚持着：自己在某时某地看到过油印件。来人又一阵冷笑：

“又说谎话。我们换个地方谈谈？”

大家都明白“换个地方”的意思。高老头急了，他要求四个公安人员先到外屋。

“小李，你好好同我说，我再去跟他们说。换个地方不好。”

李君旭望着高老头，他那佝偻的腰似乎更显得厉害了，他那额头的深沟里都急出了细汗。李君旭一阵难受：

“高书记，让我跟他们去吧！”

高老头边摇头边一股劲儿叹气，公安人员已经进来了。李君旭说：

“可不可以让我回车间换下工作服？”

公安人员把手一挥：不必要了！

李君旭向中吉普走去，他故意把步子、动作放得很慢。他

所在的机修车间离厂部很近，他希望正在下班的师傅和他同宿舍的好友小张能看到，能替他通知他的母亲，让老人家晚上不要等着为儿子开门、热饭了。然而，那边并不见小张的影子；师傅呢？大概自行车还没有修好，师傅还在车间等自己吧？可自己回不来了。李君旭真有点想哭了。

四

5天之后，李君旭承认了自己就是“遗言”的制造者。因为全国范围内的追查集中到了杭州，而杭州市公安局已查明最早是从李君旭那儿传出来的。这使李君旭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可李君旭的承认使公安人员大吃一惊，他们根本不信“遗言”会出于这个嘴上无毛的孩子之手。李君旭拿过一张纸，写道：

我向你们承认，“遗言”是我写的，日期记不准了，是2月初的一天，我的日记本上有记载。地点在我厂宿舍，原稿我已销毁。我保证：第一，我在写“遗言”前没与任何人商量；第二，我在写“遗言”时，没任何人参与；第三，写完之后，没经任何人修改。

女民警瞪大了眼睛，拿走了李君旭的保证，去了打印室。李君旭如释重负地吁了一口气，5天来叫人窒息的车轮式的审问使他极度疲惫，如今他可以美美地睡一觉了。

20天之后，中吉普换成了上海牌小轿车。这同样是一个

阴雨闷热的日子，车窗却关得密不透风，深色的窗帘拉上了，只挤出一条细缝。

李君旭不知自己是被押往哪里，只感到车在杭州城里绕着道，坐在自己旁边的人不时地向前后张望着什么，并不时要求司机快一点或慢一点。这使李君旭坠入五里雾中。他被扣留以来，一直睡在市公安局一间接待室的一张沙发上。今天又要“换个地方谈谈”了？是到正式监狱？是去接受批斗？是去秘密枪毙？他后悔自己没有早早换上姐姐给自己做的那件蓝的确良衬衣。他喜欢蓝色，那是天空，那是明朗，那是自由的颜色。他觉得自己顾长的身材配上蓝衬衣是最合适的，即便是挨批斗吧，也颇显得神气。

小轿车似乎是进了一个大机关的铁栅栏门。车门打开了，面前是几股并行的铁轨。李君旭恍然大悟：自己被押到了杭州车站。但奇怪的是站台上除了公安人员，空无一人。唯见蒙蒙的细雨，洗涤着永远洗不净的乌黑的基石和轨枕。

23岁的李君旭被带进了软卧车厢。他为接待自己的“规格”感到吃惊。两个陌生军人，在他左右坐定，并向他宣布了纪律：不许靠近窗口，更不许打开窗子。

这列福州开来的车破例地在杭州站停靠了一个小时，李君旭后来才明白，这是等待和他同案的其他六名“重大政治犯”上车，又不让他们彼此看到。

难堪的沉默中止了，李君旭从铁道两旁景物的移动方向，判断出自己是被押往北方了。

五

李君旭直愣愣地望着窗外。旷野旋转着向后退去，夏季旋转着回到了冬季。

周恩来的逝世，使得这个冬季成为最漫长、最寒冷和最难熬的冬季。2月5日，李君旭的一个刚从农村抽调回城的同学宴请小朋友们。这群20刚出头的热血青年，一聚到一起便指点江山，粪土王侯，无所顾忌。他们谈总理，谈时局，忧国忧民。这大概是“文化大革命”的仅有的积极成果吧！既然国家的政治关联到了每一个人的生死荣辱和生活命运，每一个人，包括这些刚从父母羽翼下初登人生舞台的小青年，也不能不关心起国家的政局来。

狗肉和酒下了肚，牢骚就多起来，情绪也激烈起来。

“周总理的遗嘱，就是把骨灰撒掉这一句话吗？肯定还有别的话。总理的话他们不听，临终有什么指示肯定也被封锁了。”

“这次我们一定要有所行动，再不能等下去，时间对他们有利。我们不能让他们安静下来，造成既成事实，按部就班地夺权。我们要给他们制造混乱……”

“广大群众是否同我们想得一样，一定要搞得更清楚。有一点是肯定的，大家一是怀念总理，二是要保持1975年的形势，不能让翁森鹤出狱……”

这群年轻的政治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天下兴亡。李君旭偶尔插着话。他的性格是不多讲，讲出来就要不同凡响，做出来就要一鸣惊人。此刻，他脑海里正出现的是，一个年

迈的老工人，拉着板车吃力地走着，旁边是他的五个女儿帮他推着车；还有一个年轻的工人，天天卸完板车就赶忙下河塘摸螺蛳……这是李君旭刚从浙西林场回来，在一家肥皂厂当搬运工时见到的两个镜头。这两个镜头给他的震动太大了：人民的生活还这样穷困，可报纸上的假宣传甚嚣尘上。

啤酒泛着泡沫。朦胧之中，李君旭眼前又出现了两年前看的一部纪录火山探险的外国影片：勇敢的探险家下到火山口边上，身旁就是烈焰滚滚的熔岩。探险家冲上去了，伸出了长勺……李君旭被振奋得似乎自己也跟着冲了上去——“呵，火山，我相信，我能亲眼见到你的爆发。”

“对！写文章！不是说‘对着干’吗？同他们对着干！”一个念头在这群小青年心中同时燃亮。

“实在不行，还可以回我们的建设兵团。那里山高林密，可以打游击。”

……觥筹交错，热血沸腾。他们已经时刻准备着迎接一场伟大的战争。他们就是火山耀眼的熔岩，一旦喷发，那雄踞山顶的巨石也会被抛上九天，那依附于山坡的草木，更会在眨眼之间化为缥缈的青烟。

这是李君旭当天的日记：

今天开始上班，得知中央1号文件消息。晚上建树请客，中伟、建人、建新、小路、辰光都到席。畅谈，畅吃，畅饮。看来，我们的一些打算应提上日程。人、路兄明离杭返湖，那边是一个有奔头的好地方，我对此寄予极大希望。我们在凛冽的寒风中紧紧握手，简短地话别。

朋友，不，同志！我们将不会忘记，这是我们走向成熟

的新起点，这是在总理去世后的悲痛日子里。

李君旭回到自己的斗室。这是离西湖不远的一条路上一幢日本式的小楼，他的父母住在楼上，兄嫂住在楼下，他的小天地是一间不足七平方米的亭子间。唯一的陈设是一个书架和一张书桌。

他陷入冥思苦想之中。他要动手写一篇文章了，他觉得，这样的文章，一要短，二要鲜明，三要同周总理联系起来，那样容易发挥作用。他试着开了几次头，想写成宣言式的，但都被自己否定了。那样势必拖长，道理也讲不清楚。

……灵感终于来了！遗言！写成周总理诀别信的口气！李君旭不由得一阵激动。他自己也感到：终于突破了，不能再回头了。但这个主意，不能同任何人，哪怕最亲的亲人、最知心的朋友谈。

他在工厂的单人宿舍只找到一本龙飞虎的回忆录和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太少了。他于是接连几天长途跋涉，从半山赶回家来，为的是收集和阅读有关总理的生平资料。白天一有空儿，哪怕是去食堂到车间的路上，他都打着腹稿。

“倘若总理活着，总理是会出来说话的，有些话可能已经说了。我偏要让人们记起总理，总理不赞成他们……那么，总理可能会说些什么呢？”

这一天下班之后，李君旭没有回家。春节刚过，厂区显得冷冷清清。单人宿舍区前面暗绿色的冬青树在湿冷的风中瑟缩着，香樟树也显出一种焦苦和灰黄的颜色。看来，即使是常青树也盼望春天和阳光，更不必说那些树干斑驳的法国梧桐和皂夹树了。

他的宿舍在四楼。一间向北的屋子，只住着他和 19 岁的徒工小张。两张双层床，下层睡人，上层零乱地堆着杂物，床下扔着旧鞋、空啤酒瓶。他比较爱干净的，但也免不了沾点单身汉宿舍的邋遢劲。不过因为他的稳健和谈吐间显得有“墨水”，小张把他当作老大哥一样崇拜和跟随。

天色暗了下来。李君旭坐到靠窗的自己的床上。他把书桌横了过来，好侧着脸随时看得到门口的动静。小张出去玩了。他披上棉袄，从容地抽出了几张 16 开的记录纸。

思绪竟像喷泉一样涌了出来，一切都已瓜熟蒂落：

我自第二次手术以来，病情曾有短期稳定。从下半年开始，癌症已广泛扩散，虽然自觉尚好，但去见马克思的日子确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中央汇报一下近来的一些想法。

患病期间，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感动。主席年龄大了，要注意身体。有主席为我们党和国家掌舵，是全国人民莫大的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这些日子，主席在遵义会议时和我的谈话总是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为主席分担一些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前途，主席一定要保重。

.....

朱德同志和剑英同志年事已高，要多锻炼身体，当好主席的参谋，具体分工是可以摆脱的。但是，你们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我们老一輩人，跟主席那么多年了，更要以高昂的战斗精神，保持晚节。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关于贯彻主

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的。

.....

同志们，长期以来的病假，使我有机会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程。在这段曲折的路上，我永远不忘怀那些在我们前面倒下的先烈。我们是幸存者。1926年我和恽代英同志分别时，他说：“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我们能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的同志的墓前，去告慰他们，死者会听到我们的声音的。”我总想着，用什么来向他们汇报呢……在此弥留之际，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们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点工作而感到内疚。……展望本世纪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死对于共产党员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把生命交给了人民的事业，而人民的事业是永存的。唯一遗憾的是我再也不能和同志们一起前进，加倍工作，为人民服务了。同志们，一定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关于我的后事，我向中央请求：一、将我的病情发展告诉全国，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测。二、追悼会主席不要参加，会应力求简单，请小平同志致悼词。三、骨灰不要保存，撒掉。

.....

草稿很快写成了，他马上抄一遍，然后将底稿烧掉。

小张推门进来了，李君旭赶紧把几页纸收到抽屉里。小张带着几分神秘感问道：“是写情书？”

“有可能。”李君旭报以一笑，随便地答着。

小张做了个鬼脸，去别的房间串门了。李君旭又把纸拿出来，细细地再读一遍，自己也竟被感动得抽泣起来。他呵呵冻手，抬起泪眼朝向窗外。远处，杭州钢铁厂正在出铁，一片红光笼罩着蜿蜒起伏的半山。他希望这片红光永远不要隐去，好把这寒冷的夜、寒冷的土地烘烤得暖和起来。

第二天晚上，李君旭又将“遗言”看了一遍。他觉得毛主席同周总理在遵义会议上的谈话是不能乱编的，也编不出来，于是灵机一动，加上一个括号：“此处文字原件不清”，这样就更像一个辗转传抄的消息。李君旭为自己这一发明颇有几分沾沾自喜。他又将全文重抄一遍，放到棉袄的内侧口袋里，紧贴着心口。

此刻，他感到自己像一个打完了一场大仗的将军那样平静了。他摊开自己的绿皮红花塑料面日记，写上了这样一行字：

二月十一日，星期三，阴。这两天住在厂里……

六

车轮和铁轨碰撞着。

李君旭要上厕所，看管他的军人先拉开车厢门出去，似乎布置了什么，才向他招招手。李君旭每次走过过道，都是

除了关照自己的那个军人外，只有自己一个人。难道这节卧车成了自己的“专列”？

他是在2月17日，第一次把“遗言”拿给厂里的电工小陈看的。小陈还没看完便激动起来：

“你是怎么弄来的？”

“抄来的。你看像不像吧？”

“像的像的。你借我一天！”

第二天，几个小朋友到他家，他又出示了“遗言”，几个人当场要了纸抄起来。

“遗言”就这样传开了。

“遗言”中所表现的周总理在生命垂危时还缅怀先烈，还为今天中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感到难过的心情，他那种为了人民的事业奋不顾身的牺牲精神，那种对同志、对战友的真挚的情意，是感人至深的，许多话是符合总理的思想的，这是“遗言”之所以打动了千千万万人的主要原因。而另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则是“遗言”充分肯定了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抓“整顿”以来的巨大成绩，明确地要小平同志承担更重的压力和担子，要小平同志致悼词，这无疑是打击了张春桥倒邓篡权的野心，符合当时全国大多数人民群众和党政军干部的愿望。

仅过了几天，他的父亲、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院长李容兴致勃勃地拿了一份油印的传单回家，老头子做梦也想象不到那竟是自己小儿子的杰作。李君旭掩饰不住自己得意的神情，但即使在父母兄长面前，他也是只字不露。

一个月过去了，天地翻覆，风云突变。北京爆发了天安门事件，李君旭激动得都碰碎了玻璃。他在日记上这样写道：